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胡乔木

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

HUQIAOMU DUI ZHONGGONG ZHONGDA ZHENGZHILILUN DE WANNIAN SIKAO

鲁书月◎著



人民
出版
社

胡乔木

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

HU QIAOMU DUI ZHONGGONG ZHONGDA ZHENGZHILILUN DE WANNIAN SIKAO

鲁书月◎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鲁书月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ISBN 978-7-01-010403-4

I. ①胡… II. ①鲁… III. ①胡乔木(1212~1992—政治思想—理论研究
IV. ①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2224 号

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

HUQIAOMU DUI ZHONGGONG ZHONGDA ZHENGZHI LILUN DE WANNIAN SIKAO

鲁书月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0403-4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胡乔木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党思想文化理论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一生,经历独特,历任毛泽东秘书,再任邓小平助手,继又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他一生代党立言,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的文件,写了无数的社论和评论,被邓小平誉为“党内第一支笔”;他编辑整理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为阐述、发挥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用他名字发表的理论文章不多,但党的理论财富中,他所作的贡献,占着相当大的份额”^①;他忧国忧民,并且“忧得很深”^②。杨尚昆同志认为:胡乔木“个人已经同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③。胡绳先生则认为:“像胡乔木同志这样……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见解,把自己的一生卓有成就地献给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样的人至少是不多的,或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④

所以,“胡乔木作为一个人物,很值得研究”。对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不仅对理解他这个人物有意义,而且对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⑤。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胡乔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不仅表现在已出版的有关胡乔木的著作大部分属于资料性质,研究性的著

①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②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③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④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⑤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述仅限于少数一些论文,而且,也更鲜见关于胡乔木晚年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书月写的《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这是国内第一本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全面地研究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晚年思考的专著,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读后我认为写的好。

首先,把晚年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视角新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胡乔木晚年特别值得研究,而目前却鲜见于这方面的研究。晚年是人生的最后一站,要保住晚节不易,而超越自己更难。因为耄耋之年,体弱多病,既爱怀旧,又不易接受新生事物,这样就特别容易思想僵化而停滞不前,但胡乔木却超越了常理。从多年“左”倾思潮压抑下,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的他,充分运用自己一生在思想宣传战线上积累起来的经验,带着“多少年来反复思考得到的认识”(胡绳语),投身到党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为实现党在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为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集中表现在他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上。他晚年思考得到的新认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书月的书,系统梳理了1977年至1992年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复出后的胡乔木到他去世前十五年间,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对这一时期他的思考进行系统梳理,不仅对了解胡乔木的理论贡献,而且对进一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完善和发展,尽管是一个侧面,其重要性也自不待言。

其次,研究内容的选择,均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是本书的又一特点。在收集、阅读、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书月从散见于胡乔木为党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从凝聚在他的文章及平时的讲话和谈话中,提炼筛选出关于析“左”和纠“左”,关于新时期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五个方面十六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尽管书中剪裁详略不见得都是适宜的,但这些问题却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也是在

党内甚至社会上认识不尽一致、并存在尖锐对立或多有争论的问题。系统梳理胡乔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再次,作者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胡乔木晚年既是学者又兼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管领导,他担当着为改革开放催生出的新问题作理论上阐释的重任。而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各种观念的相互碰撞,所以,对胡乔木的理论观点,对他的工作,赞成的、反对的,褒的贬的,反差甚大,可谓是见仁见智。书月在评价胡乔木晚年的理论思考时,没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既没有简单肯定一切或简单地否定一切,也没有以今天的是非标准评判过去,她坚持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把胡乔木的理论思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用全面的、辩证的方法去分析,从而对许多问题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评价。对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没有回避,既指出胡乔木的理论贡献,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的理论探讨的局限和缺憾。

第四,书月这本书,尽管探讨的是政治理论方面的学术问题,但她在阐述这些理论问题时很注意语言的简洁、流畅以及写法上的可读性,书稿读起来,还是引人入胜的。

对胡乔木研究难,对胡乔木晚年研究尤难,而研究胡乔木晚年的政治理论观更难。因为,胡乔木是一个当代人物,与当代联系相当紧密,研究者往往置身于当代社会之中,不免受外在环境所影响与内在心境之囿限;还由于书中所选内容都是本来就存争议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当然也由于资料的限制,使对胡乔木的研究难上加难。好在书月有比较扎实的功底,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旦选定尽管很难但值得研究的课题,就专心致志地做下去。她从2001年开始对胡乔木晚年进行研究,至今已近十年。她的博士论文就是《胡乔木晚年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2009年,她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课题《胡乔木晚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贡献》,该书就是在此基础上修改增减而成。在成书之前,她已在《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的学报》等著名刊物上发表有关论文

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

多篇,达十五万字之多。尽管如此,书中,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评价也难免有失当之处,但我相信,这本书只是她的起点,在以后的研究中她会逐步深入并会逐步提高的。

李良志

2011 年 12 月 22 日

目 录

序 言	李良志 1
前 言	1
第一章 析“左”和纠“左”	6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析	6
二、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见解	26
三、对“党内斗争”、“路线斗争”的新主张	34
四、对中共犯二十年“左”倾错误原因的新分析	44
五、对胡乔木析“左”、纠“左”的评议	57
第二章 对中共指导思想的新阐释	62
一、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	62
二、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思考	79
三、对胡乔木有关新认识的评议	100
第三章 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新探讨	103
一、对改革开放前中共社会主义观的反思	103
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评价	110
三、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认识	115
四、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考	130
五、对胡乔木有关新探讨的评议	147

第四章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再思考	151
一、关于经济建设的再思考	151
二、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再思考	188
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再思考	199
四、对胡乔木有关新认识的评议	215
第五章 对其他重大问题的研究	218
一、1980 年代我国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218
二、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新主张	233
三、关于中共治史理念的新思考	242
四、评议	257
余 论	259
一、理论思考中可商榷的几个问题及其理论成就 总评价	259
二、晚年取得辉煌理论成就的原因	268
三、晚年胡乔木的心境解读	271
参考文献	276
后 记	288

前 言

胡乔木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中共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他的人生轨迹,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中期和晚期。1941年至1961年为早期;1962年至1976年为中期;1977年至1992年为晚期。1941年2月,29岁的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并兼中央政治局秘书,直至1961年底,这是他人生开始的辉煌期。此时的他,年轻有为,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与毛泽东主席在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朝夕相处,亲聆主席教诲,协助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文件,参加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在建国初期,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公认为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特别是1950年代,“与毛泽东的接触超过秘书的身份”。^①这段时间,他的主要贡献仍是为党和国家起草和修改重要文件,如“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宪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及主要文件他都是主要起草人,这些构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辉煌。中期即低峰期。始于1962年,止于1976年。1962年,胡乔木50岁,从生理年龄看,已步入人生的中年,他的政治生命也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走向了一生的最低谷。这段时间的前五年,尽管他仍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但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专注休息。而后十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内乱时期。他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冲击,人被揪斗,家被抄,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审查。十年里基本是困在家中,足不出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冷藏”了起来,除读书外,没有也不可能做什么事。尽管1975年曾一度协助邓小平搞整顿,即在一定的限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度内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由于毛泽东的反对,只是昙花一现。第三时期即晚年,这是他人生辉煌的巅峰时期,是他参与扭转乾坤的时代。“文革”结束一年后的1977年11月26日,胡乔木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这年他65岁,已步入人生的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委员、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等要职。晚年的胡乔木历经意识形态风雨洗礼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带着他“多少年来反复思考得到的认识”,^①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先后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等一系列永载史册的文件。这个时期,是他“搏动的核心,着魔地忙碌”时期,为实现党在多方面的拨乱反正,为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集中表现在他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上。故而这个问题也就成为本书研究的切入点。

胡乔木晚年正逢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伟大时代。对深刻变革催生出的新的政治理论问题给以解答搭建了胡乔木晚年理论研究的平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启改革开放新路首先需要析“左”、纠“左”,实现中共在指导思想及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适应形势的需要,胡乔木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特定内涵、“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作用、存在的范围、评价的标准作了新的理论阐述;对党内延续多年可以说已成为人们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凡是党内的斗争和矛盾,都要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并把党的历史归结为路线斗争史,这样一种对党内政治生活产生极其严重影响的思维模式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对中共为什么犯了“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原因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他的这些理论努力,为中共在指导思想及各个领域的拨乱

^①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反正奠定了思想认识的基础。

如何正确对待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能否实现党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新路的又一关键。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管是中共高层还是在思想理论界并不都是一致的。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既有以革命导师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论述为标准来衡量现实社会主义,从而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给以否定的,也有以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找不到今天社会主义需要的“现成答案”为由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必要性提出质疑的。而更为严重的是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足以威胁中共命运的两种主要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言论,鼓吹“两个凡是”;一种是将建国以后乃至中共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产生怀疑毛泽东思想并进而怀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

在毛泽东同志去世后的中国,确实面临着又一次“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是继续沿着“文革”的“左”倾之路走下去,或搞全盘西化,还是根据中国国情,选择一条新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显示了邓小平的雄才大略。他摒弃“否定论”,批评“两个凡是”,主张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不动摇,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如何做到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怎样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如何做到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在这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作为邓小平在思想理论战线得力助手的胡乔木,以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透彻的了解,对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以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党内第一支笔”的才能,集党和人民的智慧,对这些难度颇大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作出了科学阐释和回答。他的这些理论研究,既为我国打开新路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稳定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启迪。

胡乔木晚年的析“左”、纠“左”以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新阐释,为中共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扫清了思想的障碍。为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胡乔木对中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观作

了深刻的反思;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关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作了深入的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作了新的概括,对其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新的阐释;在此基础上,胡乔木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建设观。胡乔木晚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研究而得出的新认识,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有些理论概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笔者把胡乔木关于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关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新见解以及对中共治史理念的新主张也纳入到他晚年的政治理论的探讨中。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当时对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了政治的意义。

胡乔木晚年处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舞台的中心,也处在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决策中心,这两个中心的特殊地位使他能够从中国政治的全局来思考和研究中共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而作为一个党史专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使他又能够对中共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从学术的角度来审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渊博的知识底蕴、特殊的地位、多重的身份,使他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研究不仅有政治的高度,而且有理论的深度。

胡乔木晚年所思考的这些问题,都是新时期出现的极端复杂、难度很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界、有些甚至在全社会不同程度地引起过争论,看法多有分歧、对立。胡乔木对这些问题都一一进行了思考、辨析和解答,不少地方精辟独到,发往昔之所未发,言他人之所难言,表现出了很大的理论勇气,充分展示了其视野辽阔、头脑敏锐、思维缜密、见解深刻、辨析透彻的思想者品质。

胡乔木晚年从后台走向了前台,主管中共意识形态这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工作,担当对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理论说明这个向来很不容易并且充满风险的重任。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是利益重新分配,多种矛盾并存,新旧观念互相碰撞的时代。而中国社会变革的广度、深度、难度以及迅猛发展的速度,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思想准备,胡乔木也不例外。他曾

经努力地追赶这个时代并对社会深刻变革给以理论的说明,他也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消极影响甚为忧虑并努力想尽可能缩小这种影响,但不都是成功的。为此,社会上对他本人,对他的理论研究,对他主管意识形态的工作,有褒有贬,褒大于贬或贬大于褒,反差甚大。晚年的胡乔木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而笔者恰恰选择了他的晚年,不仅选择了他的晚年,而且又选择了更具有争议的他对于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对此,笔者也曾犹豫过,担心选择颇有争议的胡乔木晚年又选择政治理论这个更具有争议的话题进行研究是否能做到科学与公正,但最终还是下决心做下去。或许,您并不满意我的观点,我的分析,我愿意借此机会与大家互相讨论,听取批评意见,以使对胡乔木晚年的评价更客观公正,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第一章 析“左”和纠“左”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灾难过后，百业待兴，而从思想理论上析“左”、纠“左”，实现拨乱反正，可谓重中之重。胡乔木复出后的主要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对毛泽东亲自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评价的任务逐渐被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国为什么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不对？应该如何给这场运动定性？我们从中应汲取哪些教训？这一连串的问题需要中共从理论上对国人作出正确的回答。在总结“文革”教训，正确阐释以上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胡乔木作出了重大贡献。

实际上，胡乔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1975年协助邓小平搞全面整顿就开始了。“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80年前后在协助邓小平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时达到了高峰，他的主要论述大都集中在这个阶段。1980年代后期，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以及审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的谈话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人们的认识,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标准,与三十多年前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实践证明胡乔木三十多年前对“文化大革命”性质,对“文革”发生的原因,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等基本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在胡乔木晚年的治史理念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对待历史要用历史的分析方法,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就采用了这个方法。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特定内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在十年内乱中曾反复被宣传,并写入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这个“理论”的提出,有一个酝酿过程。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概念;1967年《红旗》第九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发展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直到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才正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①有关这个问题,邓力群在1981年曾回忆说:“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论点,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最近王力写了一个交代,说把这些论点加以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作的。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同意了。”^②邓力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页。

② 《邓力群同志在河北省直机关传达学习六中全会精神大会上的报告》,1981年7月21日至24日,第77—78页。

又说王力在交代中还讲到这样一件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有几次谈话很感慨，说这许多年以来，在理论问题上听不到有不同的意见。胡乔木过去常常在他面前提出一些理论原则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再也听不到这种不同意见了。”^①

王力所言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这一提法尽管不是毛泽东提出的，但却表达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由此使之成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并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据中共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回忆，在中国理论界，最早对这个理论提出质疑的是中央党校的吴江。吴江在中共中央党校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的《理论动态》第一期上发表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该文从理论上阐明，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强调不断革命的重点要放到技术革命上而不是不断反右，并明确地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应该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这篇文章所宣传的观点与当时所提倡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宣扬的观点是很不相同的。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鲜明地提出“继续革命”的问题需要探讨。多年来，一直说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而且写进了党章，大家只有反复学习领会的义务，而不容有任何怀疑。这年的5月1日，全党仍被要求认真学习这个理论，坚持这个理论为指导。而吴江的文章却提出“这个问题需要探讨”，实际上对其真理性提出了质疑。尽管这篇文章并没有公开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给以公开否定，正如胡耀邦所说，那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已属不易。^②另据郑惠回忆：黎澍先生也较早地对这个理论的正确性提出了质

① 《邓力群同志在河北省直机关传达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大会上的报告》，1981年7月21日至24日，第78页。

② 沈宝祥：《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载《学习时报》2003年8月11日。